

A Reflection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跨国教育反思

陈 申 著 Shen Chen



龙虫之间

当代世界出版社

龙虫之间

陈 申 著 Shen Chen

跨国教育反思

A Reflection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龙虫之间：跨国教育反思/陈申著. -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9

ISBN 7-80115-575-0

I. 龙… II. 陈… III. 留学生教育-研究
IV. G64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4391 号

书 名：龙虫之间：跨国教育反思
A Reflection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出版发行：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复兴路4号 (100860)
网 址：<http://www.worldpress.com.cn>
编务电话：(010) 83908404
发行电话：(010) 83908410 (传真)
(010) 83908408
(010) 83908409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首钢总公司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13
字 数：310 千字
版 次：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3 年 1 月第 1 次
印 数：1-5000 册
书 号：ISBN 7-80115-575-0/G·81
定 价：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前

言

开门见山：山外有山，楼外有楼，本书介绍的不是海市蜃楼。没有外国中餐馆的烟味和油腻，没有海外飞来的横财和商机，没有异域的桃花运和艳遇，没有惊心动魄的偷渡和格斗，用简洁朴素的语言，讲一个平凡而真实的教育故事，让实例来回答三个问题：去海外读书前需要培养什么样的素质？在外国会遇到什么样的文化冲突？西方英语国家的教育究竟与中国的教育有什么不同？

讲故事的我，是和你一样的黄皮肤，黑眼珠的中国人。唯一不同之处，喝了一些外国洋墨水，照了几面西洋哈哈镜，看世界的形象可能与你出入，用洋腔说出的故事未必十分顺耳，不过请相信我的故事一定会给你带来一点乐趣，一些启示，一番反思。

前

言





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我经历了“三十年河东，二十年河西”的变迁。35岁以前在国内完成了小学、中学、大学的教育，并先后当了由“民办”至“公办”的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教师；35岁以后，在海外留学，完成了研究生的教育，又分别担任了国外小学、中学、大学三个层次的教职。

在海外的近二十年里，由于工作的原因，我有机会深入地考察和比较澳、加、英、美等西方操英语国家的教育体制和学校情况，对这些国家的大、中、小学校系统可说有了一点发言权，曾想动手写一点中文的东西，以供国内读者参考。可是两次提笔，均是有始无终：80年代初结束了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和维多利亚学院一段教学生涯之后，打算在回国以后发表纪实性的新闻报导，向国内介绍澳大利亚的教育情况，后因忙于英文博士论文的写作而搁置。90年代初在澳大利亚一所集小学和中学为一体的私立学校任教，目睹大量从台湾赴澳的少年留学生和香港来澳小移民所面临的重重困难，萌发出写一本描写华裔小留学生生活的纪实小说，拿到港台去发表，让家长知道他们子女在海外的种种问题，不负“可怜天下父母心”。不料写了两章，发现自己多年习惯于用英文写作学术论文，形成一股刻板严谨的文风，“因为所以”，不绝于口，“不但而且”，笔下皆是，中文长期不用，笔拙词穷，写出来的东西丝毫没有一点文艺作品的味道，连自己读起来也味同嚼蜡。既然没有创作天才，何必自讨没趣？书稿便自然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

自1994年起，我每年回国一次，养成一个习惯，返飞之前必购买一本反映各国留学生生活的书，一来回味当年第一次离家出国远行的情感，二来在从北半球飞往南半球的旅途中认真学习别人的经验。数年下来，已有很多作品上了我的书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自己也不免萌发出试琢一块石头的念头来。

平心而论，现已出版的反映中国留学生在海外的生活的书不乏珍品，多是切身感受，脍炙人口，使人读了以后回味无穷。特别是为没有去外国的家长和尚未出国的学子提供了宝贵信息。当然

也有属于“鱼目”的一类，道听途说，笔下生花，除了给人以不同凡响的感官刺激以外，还相当有害，让读者得到一种非此即彼的假象：外国不是天堂就是地狱，外国人非神即鬼。

70年代后期国门初开，人们仅想从狭窄的门缝中窥见外国的粗描轮廓，就心满意足；到了80年代国门渐开，描写海外留学生生活片断的文学作品，开人眼界，适逢其时；90年代国门敞开，具有相当海外生活阅历的留学生纪实作品更受国内读者的青睐；进入21世纪的今天，国门大开，伴随着久未退烧的出国热，又出现了学有所成的留学生到国内寻求发展、实现自我价值的回国热。国内读者已不再满足于知道外国的“枝叶”，也不满足于了解外国的“森林”，而是希望洞察与透视“树根何在？”“哪岸的树更绿？”“生长环境有什么本质的不同？”等不易一下子看清的东西了。

当今以独生子女为主体的中国留学生不再以一穷二白的面貌跨出国门，并且年龄呈越来越小的趋势，从读研究生发展到读本科生，继而发展到读中学、小学，以求早日成才。在这种形势之下，如果有熟知中西双方的教育体制，并深谙其文化根源的学者或教师，能作出一番有科学理论根据的分析，说出一些与众不同的忠告和“高见”，恐怕是难能可贵，受人欢迎的。只有在时间和空间中来回踱步，不断比较和自我反省，才可能拨开“庐山”的重雾，识破其真面目，否则，海外留学生的经验对怀梦的家长，追梦和圆梦的学生永远只能停留在一部离奇小说的水平上。

在第三次提笔的时候，我独出心裁地采用了我们这一代人所熟悉的“自我交待”和“思想汇报”式文体，既交待事实，又深挖根源，还模仿故乡江苏流行的扬州评话、苏州评弹式的风格，有说有议，边评边弹（谈）。全书共分十二章，以我个人的成长过程和国内外亲身经历为主线，前五章侧重我在国内就学从师的一些片断，与我在国外所见所闻相对照；后七章注重我在海外继续深造和执教的经历，与我对往事的回忆来作对比，以便将琐碎的小故事串成一个来龙去脉井然有序的大故事，达到揭示中西教育的异同和利弊





的目的。

无论大故事还是小故事，均为真人真事。绝大多数的人物，在征得本人同意后采用真实姓名，无法取得联系或有嫌触及个人隐私者一律用化名代之，倘若恰好有人和事与故事内容有相似之处，纯属雷同，请千万不要对号入座。涉及有关教育理论根据的资料，一一注明出处，列在书后，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提醒读者，我充其量不过是一位资深教师，写作不可与专业作家同论，加上多年不用中文写作，不进则退，词不达意，请不要对故事的文艺价值有过高的期望，多留心教育方面的意义，寻求你要找的答案，获取对你有用的启示。

陈申

写于澳大利亚

二〇〇二年四月

目 录

MU LU

前言	//	1
第一章 龙的传人	//	1
龙虫之辩	//	1
望子成龙	//	9
落难公子	//	13
特殊胎教	//	17
第二章 移民学童	//	22
随父三迁	//	22
家庭作业	//	31
星光闪闪	//	38
正负榜样	//	45
第三章 风吹浪打	//	56
难得三好	//	56
同窗同桌	//	62
精英高中	//	69
大风大浪	//	75
第四章 日晒雨淋	//	87





	生存斗争	//	87
	性教启蒙	//	96
	良师益友	//	104
	初为人师	//	109
第五章	一进大学	//	121
	笨学外文	//	121
	教育改革	//	129
	关键时刻	//	137
	外籍教师	//	142
第六章	越洋过海	//	150
	意外机遇	//	150
	南辕北辙	//	158
	特殊礼物	//	168
	文化翻译	//	177
第七章	二进大学	//	182
	哑巴学戏	//	182
	三易课题	//	189
	阴晴圆缺	//	200
	不测风云	//	206
第八章	异国园丁	//	214
	学校求职	//	214
	重操旧业	//	224
	课外活动	//	230
	小留学生	//	238
第九章	家庭教师	//	247
	难为父母	//	247
	中西混血	//	255
	三择学校	//	263
	秀才中举	//	272

第十章	三进大学	//	282
	柳暗花明	//	282
	重返母校	//	288
	故人情结	//	294
	亲情难报	//	301
第十一章	寻访各国	//	309
	美国之行	//	309
	访加拿大	//	326
	游新西兰	//	333
	英国掠影	//	338
第十二章	迷途知返	//	350
	博士导师	//	350
	院长副官	//	358
	难入正册	//	366
	叶绿归根	//	374
参考文献		//	381



第一章 龙的传人

龙是中国的文化图腾。龙象征权力、智慧和成功。海内外的炎黄子孙都是龙的传人。望子成龙是中国人特有文化现象，具有历史的渊源，教育被认作成龙的必经之道……

龙虫之辩

似乎又是一个老生常谈的故事：一位中国学者在国际会议上引起轰动，语惊四座，掌声雷鸣。

2000年7月18日上午，在英国牛津大学庄严肃穆、古色古香的圣安学院会议厅内，来自世界各主要操英语国家和中国台海两岸的学者，济济一堂，出席一场对以英语为母语的汉语教学国际研讨会。牛津圣安东尼学院院长、中国研究综合委员会





主席，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公使，牛津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所长，中国对外汉语学会会长，英国汉语教学研究会主席和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长都亲临研讨会，不愧是群龙聚首，八方豪杰交流比武的场面。

中心发言的第二位学者，来自英国北部的一所大学，他的中文名字叫“司马灵”。在座听众油然联想起完成巨著《史记》的司马迁，路人皆知的司马昭，还有打破缸的司马光。给人造成最初的印象：他一定是个了不起的汉学家，通晓中国的政治、历史、语言和文化。可是很快使人失望，登台以后用英文而不是中文宣读他的科研报告：以该校学生在中国某大学学习汉语的经历为依据，批评中国的教学方法大有问题，课程设置和教材也相当糟糕。

“中国人似乎只关心语言的结构，语法第一，根本不考虑意义的重要性。”他提高了声音说，用眼睛扫了一下在座的听众。“我们的学生都觉得学不到东西。”接着他肩膀一耸，两手一张，“都跑光了！”突然他冒出了一句中文，相当清楚。

台下听众一下子惊蒙了，先是鸦雀无声，紧接着一阵骚动。一位来自他所指的中国大学的访问学者显然早已如坐针毡，脸上露出不自然的窘笑。

司马灵注意到大家的反应，话题一转，旁若无人地继续：“归根到底，中国的教学实践并没有建立在科学的理论上，教育哲学也值得怀疑……”打击面倾刻从一所大学扩大到全中国。

“根据西方的教育理论，中国的教学应当作如下改革：A...，B...，C...，D...和E...”他看了看手表，甚为得意自己在规定的时间内口若悬河般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而且面面俱到，剩下五分钟该让听众提问，说了声“谢谢”便戛然而止。

主持人邀请大家提问，谦虚的中国学者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该问什么是好。有人在想，“他针对的是别的大学，我们大学可不是这样，与我无关，有什么可问的呢？”

有人心里暗暗在骂：“你这个洋鬼子也太不客气了，一点面子

也不讲,会说几句中文就指手划脚,说三道四!真该回敬你几句!”可是又一想,“何必由我来出头呢?这么多专家能人在此,他们会带这个龙头。”于是自缄其口,沉默等待。

一个上了年纪的学者终于发了言:“你刚才的讲话很精彩,提的意见也很中肯。不过可能是个别现象,你能不能再提出一点有益的建议呢?”权威张了口,便有几位同来的学者们不由自主地频频点头,齐声附和:“对!对!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司马灵的回答简明扼要:“我刚才总结的五点已经充分地表达了我的看法。”又是几秒钟的死寂,只见主持人指了指坐在后排的听众,“后面的那一位先生,请提问。”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话音刚落,大家的眼睛不约而同地转向后排。只见一位五十上下,身体微胖的“眼镜”先生坐在不显眼的角落里,一脸倦色。他手中拿着记满字的小笔记本,不慌不忙地用澳式英语开了腔:

“司马先生,对于你刚才使用对中国一所大学所做的一次量化调查的结果我一点也不怀疑,也不吃惊;对你所应用的西方教育理论根据我没有任何异议。只是你有没有考虑到,这里还有一个文化价值观的问题:西方的教育理论产生在特定的西方文化和社会环境中,表现出西方人对教育的信念和观点,就和孔子的教育思想只会产生在中国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和历史条件下一样。在英国是产生不了儒家教育思想的,尽管英国人可以去研究儒家思想,但未必一定要接受它所表现的文化价值。你说对不对?”

司马灵在本校的讲座中早已对坐在后排的亚洲学生作了定论:他们永远没有问题,个个都是金口难开。对这位带有浓重口音,英语却很流利的亚籍学者的突然举手提问有点意外。他很快镇定下来并慢条斯理地说:“请说下去,请说下去。”

“请你告诉我刚才的观点对还是不对。”提问者紧追不放。

“有道理,有道理。”司马先生点头表示肯定。

“既然你赞同我的观点,那么你用西方的理论去硬套中国的教





育实践，难道你不担心文化的差异和价值观的不同有可能误导你的研究结果吗？说不定你现在已经得出了一个张冠李戴的错误结论，你想到没有？”提问者一步也不肯让。

“这个……”司马先生立刻变得支支吾吾。

“让我来告诉你一项我用了历时六年所做的量化研究，我每年带领一批澳大利亚的学生去中国实习教英语，分别在北京、南京和西安的三所大学作实地调查，我发现我们的学生用西方教育理论为依据的方法也遭到类似的批评，中国学生抱怨学不到东西，四个星期教下来，上课的学生一个接着一个‘举脚表决’：脚底抹油，溜之大吉，也跑得差不多了！”说完也模仿司马灵刚才那样双手一张头一缩，一副可笑的样子。

“这不能说明教师使用的教学方法不好，只能说明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对外国教师所用方法所包含的文化价值观不肯认同，因为……”

“请停一停！”主持人突然打断了发言：“时间不够用了，还有下面一个中心发言者要说，请在会议后个别交流。”

时间恰好帮助司马先生下了台阶。提问者仍不罢休，连忙说：“后天我也有一个同样课题的发言，刚好对司马先生的观点进行挑战，请司马先生也给我提意见，多谢大家。”

这个提问者不是别人，正是从南半球的冬天直接飞往北半球的夏天，又因从东半球至西半球时差之别仅在48小时内闭眼4个钟头的我。

会间休息喝茶时，我和司马先生交换了名片。当他看到我的名片上写着“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育学高级讲师”时，他足足盯了我一分钟。在等级森严的英联邦大学职称制度中，高级讲师的位置与美国的副教授平行，与港台的新规定的头衔“正教授”相当，当教授的华人乃为不多，“当洋官”的华人更是凤毛麟角。对眼下这个中国人需刮目相看，可能是棋逢敌手了。他很有礼貌地用中文流利地对我说：“陈博士，您今天提出了一个很

好的问题。”

我注意到他的绅士风度,使用了“您”而不是“你”,更没有把我错称为“申博士”。语音虽带洋腔,中文用词造句相当地道。

“我们在理论上没有任何分歧,但我十分注重实践,特别讲究教学效率和学习成果。您知道,这就好比黑猫,白猫……”我立刻明白,我碰上了一个机智渊博的“中国通”。

我在两天后的发言被安排在午饭后通常中国人睡午觉的时间,可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在澳洲早就改掉了睡午觉的习惯,加上时差还没倒过来,当时正是澳洲的午夜时分,两天的会议下来,已欠下了许多觉,随时都可能倒下睡着。因要发言,精神很亢奋。听众也来了很多,大家都认为有好戏看。司马先生早早就坐在前排等候。面前放着笔记本,手中的笔在不停地旋转着,脸上露着狡黠的微笑。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发言前那所被指名的中国大学的访问学者特地到我面前打招呼,不要伤了和气,照顾一点司马灵的面子。至少讲中文时,说慢一点。我答应说我一定会放慢说话的速度,让司马先生听懂我的每一句话,这样才能得到他的批评。

“至于面子问题,你的顾虑是多余的,据我所知,西方的学者一般都很喜欢别人给予学术上的挑战,不会因学术上的争论影响到个人的关系,更不用担心伤了和气。”我心平气和地对该访问学者说。可是她一脸茫然,怏怏而去。

发言时我刻意放慢语速,力争字正腔圆,手势身体也同时“说话”,眼光不时与司马先生对撞。我用详实的数据、信服的分析 and 生动的比喻证明:当教师的文化背景和学生文化背景完全不一致的时候,教与学可能反映出文化冲突,学生对教师的教学方法认同与否将是学习成果好坏的关键。

发言期间,我看到许多学者包括那位长者不断赞许地点头,心中一阵激动。发言一结束,伴随一阵持久的掌声。

掌声刚息,大家的目光一齐朝向司马灵。众人皆知,这回该轮





到司马先生来向我提问了。司马灵站了起来，环视大家一周，用中文一板一眼地说：

“陈博士的研究十分有意思。对理论的分析也很清楚。不过我更重视实践的结果。现在我用两个例子来说明我的疑问。1974年英中恢复外交关系时，我当时还是学中文的大学生。第一次去中国，与中国的大学生交谈，我发现我在英国大学里学的中文，中国人一句也听不懂，中国大学生的英语我也一句听不懂，交流不起来，这不说明中国的英语教学有问题吗？你能不能用你刚才的理论来解释一下？”

“这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我信心十足地说。

“那个时候中国的英语教学受文革的影响，是有很多的问题。由于没有与操英语国家的文化交流，大学里教的是一种特别的‘中国式英语’。”接着，我信口说了几句那个时代学的口号语录式英语，诸如“要斗私、批修”，“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我问了一下在座的学者是否听得懂我的英语，除了“知天命”的国内学者笑着说懂，其他人一概摇头。司马先生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我想你们英国大学脱离中国文化与社会现实的教学也一定会产生出中国人听不明白的‘英式中文’”，虽然听起来有点象‘普通话’，其实是不折不扣的‘特别话’。”我补充道。

“就算你的解释可以成立，那么你可以不可以告诉我，去年我去中国，和一位教授交谈，我说‘咱们三句话不离本行’，让咱们推敲几个典故的用法。可是那个教授竟搞不清我要做什么。我现在的中文水平比我在大学里读书时高得多啦，按照你的理论又如何解释呢？”司马先生显然知道中国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道理，并进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希望我自动“入瓮”。他的笑脸上的大嘴开始向两边耳朵不断延伸，牙齿也情不自禁地露了出来，得意的神情溢于言表。

“这个问题更能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我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从容不迫地回答。

“让我也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我有一个得意门生,也就是最好的学生,对中国的文化极感兴趣。跟你差不多,讲话很喜欢使用成语典故,就是不太重视语音和声调,有时会闹笑话。去年他在北京时,和我一起去中国的朋友家吃饺子。朋友问他要不要调料,他说‘酱’,朋友递上了‘姜’;他要‘醋’,朋友送上‘葱’;看到朋友给我加饺子,他着急,盯着我的盘子看,说也想要;朋友叫他不要‘吃醋’,他真的不再蘸醋了;朋友问他还要加几个饺子,他得意洋洋地说,‘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可是朋友似乎听不懂他说了什么,只给他加了三个饺子。事后,他很沮丧,问我为什么中国人听不懂他的话,他认为自己的中文水平很高了。我的回答是,他说话带有洋腔,打上了文化烙印,根据社会语言学的观点,听话的人立刻辨别出他不属于听话者自己所属的社团。尤其是作为外国留学生与中国朋友第一次见面,中国朋友虽很客气,却在文化上不认同他。当他借用高雅的中文典故时,中国朋友不认为这是真的,因为他压根儿没料到‘洋嘴里竟然会吐出一根象牙’。司马先生,不知道我回答了你的问题没有?”

我从司马先生的眼光里,看出他完全明白了。随着他对我彬彬有礼地说一声“谢谢”,我和他的辩论宣告结束,赢来雷鸣般的掌声。

我讲和司马灵辩论的故事绝对没有含沙射影的不良动机,将自己比喻成中国的“龙”,与外国的“虫”比个高低。我想借同司马先生的这场学术争论引出这样一种观念:没有绝对好的教学理论,也没有绝对不好的理论。我与司马灵的分歧,不在于讨论理论本身的完美和欠缺,而是就两种文化价值碰撞探讨对教学影响的深浅,因此,也不存在你错我对的问题。我们两人的立场,视角都不在同一点上,必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加上司马灵和我都不是只了解本民族文化的人:他对中国文化十分了解,我对西方文化也有所知。我们两人都企图采用对方熟悉的策略来互相说服对方,与仅知本民族文化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争论有着本质的

